

# 中日文化交融的艺术之花 ——《名人》的发生学考察

周 阅

**提 要** 本文试图从文学的发生学的立场来考察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名人》的形成过程。从取材来看,《名人》诞生的最直接契机是川端康成对名人告别赛的采访,以及他对围棋的热爱,而后者还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吴清源及其调和理论以及由此而折射出来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背景,都影响着《名人》的创作风格和主题内涵,并且还进一步影响到川端对文化艺术的思考。现实生活中的名人与文学作品中名人的距离,显露了作者的审美价值取向,也显露了横向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纵向的历史文化传统。

**关键词** 发生学 吴清源 调和论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中形成的,因此文学文本的故事、情节、人物当中也就必然蕴涵了特定的文化意义。通过对文本中场景的设置、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塑造等方面的考察,可以推定和说明文本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同时,通过对文学文本生成轨迹的摸索,也可以凸显文学文本中内含的审美意识特征。对于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文学史”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符号学”的方法、“形象学”的方法等。本文试图从文学的发生学的立场来考察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名人》的形成过程。

一提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学,恐怕不少人都立刻会联想到温柔纤细、美丽娴雅的日本传统女性。的确,在川端康成的心中,女性是美的化身、艺术的化身,也是他殚精竭虑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创造和赞美的对象。川端康成一生的创作,绝大多数是以女性为主人公,他的散文、随笔

和日记也大都离不开女性。但是,在其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却有着唯一一部纯粹以男性为中心的小说,精彩地展现了男性深沉博大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名人》。这也是川端本人非常满意的一部作品,对他来说这“是一本没有前例的作品,对文坛也是如此”。<sup>①</sup>事实正是这样,在日本文学史上,此前此后都没有出现过同样题材和风格的作品。川端在新潮社出版的十六卷本全集的第十五卷后记中明确地说,在他的近作里,与《千羽鹤》和《山音》相比,他自己更喜欢、也更满意《名人》。而《千羽鹤》还是川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三部代表作之一。由此可见川端对这部作品的钟爱和自信。

无论从作家个人的创作生涯还是从日本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名人》都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在谈到《名人》的性质时川端说:“作为小说,它纪实的成分多了,而作为纪实,小说的成分又多

<sup>①</sup>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独影自命》,叶渭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40页。

了些吧。”<sup>①</sup>那么,这样一部作品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涉及到作家的兴趣爱好、生活际遇以及创作期间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许多因素。

从小说取材来看,造就这部著名的带有纪实性质的小说的最直接契机,应当是川端康成对名人告别赛的采访。1938年(昭和13年)6月至12月,川端应《东京日日新闻》(现在的《每日新闻》)之邀,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跟踪观看了“本因坊秀哉名人围棋引退战”。“本因坊”是1590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授予棋艺最高超的日海和尚的称号,由此开始了本因坊的世袭制。秀哉是第二十一世本因坊。“名人”是日本围棋国手的最高称号,是终身制,但不能世袭。一代国手秀哉离世后,“名人”的称号也被废除了。此二者代表了日本棋界的传统制度。日本棋界的常胜将军秀哉名人以65岁高龄举行的这场告别赛,川端康成作为本场赛事的特约记者负责撰写观战记。受命于人而写作的观战记成为《名人》的原始蓝本。

但是,观战记毕竟是一种纪实报道,而非文学创作。川端一直想把它改写成文学作品,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秀哉名人在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下,凭着他深厚的棋道修养,完成了早已超过肉体承受极限的最后一盘棋,这是精神的力量,是生命追求与艺术追求的统一。正是这一点使川端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对人生与棋道的感怀,使得改写小说的想法在川端心中涌动、酝酿了多年。四年之后,川端开始围绕这一主题进行创作。从1942至1948年(昭和17至23年),他先后写了《本因坊秀哉》、《名人》、《夕阳》、《故园》、《花》、《未亡人》等短篇,并试图将这些篇章中的材料汇总融合,但始终未果。1951到1952年(昭和26到27年),川端又分别创作了《名人》、《名人生涯》、《名人祭祀》,分三次刊载于《新潮》和《世界》杂志上。这次,川端认为他的《名人》“大体上算是写完了”。但他仍不满足,此后的两三年间再次抓住这一题材写了《名人的素养》、《名人的余韵》等相对独立的短篇。直到1954年(昭和29年)7月,才连同《吴清源棋谈》一起,由文艺春秋新社结集出版了经过重新修改的单行本《吴清源棋谈·名人》。至此,川端倾注了整整十六年的心

血,在积年累月的反复琢磨、提炼和修改之后,终于完成了《名人》的定稿本,“了结了由观战以来的宿愿”。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名人》的诞生同川端康成的个人爱好密不可分。可以说,《名人》是川端的围棋爱好与文学事业最为完美的结晶。或许对于羸弱瘦小的川端来说,围棋是少数能够接受的竞技项目之一,同时也符合他清寂寡言的个性。川端是日本文人围棋会的会员,他曾经通过文学创作来支持围棋事业的发展。在他所有的爱好中,唯一自始至终满怀热忱、情有独钟的就是围棋。

实际上,川端对于围棋的近乎沉溺般的钟爱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川端开始报道“秀哉名人围棋引退战”的时候,正是日本向中国全面开战后的第二年。被裹挟在混乱时局之中的川端,每当感到彷徨无奈、情绪低落时,便会在夜阑人静中独自面向棋盘打着高手精彩对局的棋谱。他的日记里频繁出现与友人对弈直至深夜的记录。战争爆发后不久,川端即转向写作围棋观战记,这并非偶然。围棋可以使他暂时忘却尘世的烦恼。

在秀哉名人引退战期间及赛后,战争仍然在不断升级。川端却在国内外一片喧嚣中静静地守着东方古老的围棋,并保持着与名人、木谷实、吴清源等人的交往。1941年(昭和16年)春,川端接受《满洲日日新闻》的邀请,和著名棋手吴清源以及围棋评论家村松梢风一起到中国东北地区旅行,参加该报主办的围棋大会。这是川端第一次到中国,前后逗留了一个半月。当时小林秀雄等人组成演讲团准备前往朝鲜,他们邀川端同去,川端笑言:“我是爱下围棋的人”,委婉地拒绝了参与同战争有关的活动。

同年九月,时局更加严峻,川端也不得不接受日本关东军的特邀再赴满洲。回到日本后,他先后完成了文学杂感《满洲国文学》、《满洲的书》,编辑了《满洲国青少年生活记》和《满洲各民族创作选集》。这些就是川端第二次中国之行的全部成果,这些作品尽量从纯文化的视角出发,几乎一律回避了政治与战争的话题。中国旅行之后有两年

<sup>①</sup>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独影自命》,叶渭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40页。

之久,川端难于从事写作,他把这种困境归咎于旅行中所受到的心灵的震撼。当战争的硝烟渐渐遮天蔽日的时候,川端惟有使自己更深深地沉醉于围棋那神奥玄妙而又静谧无边的世界。他让自己的心寄托于《名人》,以反复拼接、删改、组合《名人》的素材来逃避沦为军国主义御用文人的命运。正如他本人所言,对“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他进行了“最消极的协作”和“最消极的抵抗”<sup>①</sup>。吴清源曾经在《天外有天》中引用过棋界女前辈喜多文子的话:“只有围棋,因为是无言之物,不会祸从口出。”这句话不仅颇得吴清源之心,恐怕同时也点中了川端的要害。

统观《名人》这部小说的酝酿过程,正是战争从爆发到升级直至结束的年代。川端“几次尝试写这部《名人》都没有成功”<sup>②</sup>,他在《独影自命》中详细记述了每一次尝试是如何“落笔滞涩”和半途而废的。《名人》的最终成书,已是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九年。整个战争期间,川端少有辉煌的作品问世,大部分创作只是一些随笔和短篇。我们不难理解川端何以对《名人》如此惦念不已却又经年未果。《名人》的完成充分表明,川端只有在摆脱了战争阴影、进入和平环境之后,才能够拥有一份安宁的心境去了结自己的“宿愿”。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版单行本时,川端康成把随笔《吴清源棋谈》和小说《名人》两个不同体裁的作品合而为一,这绝非偶然,其良苦用心耐人寻味。吴清源是一位在战争局势下身份和处境都极为微妙的棋士,也是一位对《名人》的诞生产生过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他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名人》的创作风格和主题内涵,而且也进一步影响到川端对文化艺术的思考。

川端在《名人》中这样评价吴清源:“这位天才出生于中国,长期旅居日本,仿佛是得天独厚的象征。……我觉得中国围棋的历史远比日本悠久,它的智慧在这位少年身上放射出了光芒。”<sup>③</sup>吴清源是给予川端深刻影响的一位炎黄子孙。日本成蹊大学文学部教授羽鸟彻哉说:

“川端亲身接触、有过切身感受的中国人,除林金花之外就是棋士吴清源。”<sup>④</sup>川端眼中的吴清源,有着“融通自在的天才的棋风”,更具有“人的‘德’的魅力”。“正是这位年轻的天才,成了堪称凝聚着东洋精神之精粹的人物。如此纯洁的年轻艺术家,我还不曾遇到过第二位。”<sup>⑤</sup>对一位出身中国的年轻棋士如此推崇备至,多次在不同的文章中给予高度评价,这对于一向含蓄、暧昧的川端来说并不多见。

吴清源,1914年生于中国福建省的名门望族,祖上世代经营盐业。由于家道中落,出生百日便举家迁至北京。7岁开始习棋,11岁为谋生计作为少年棋客出入段祺瑞府邸,获“天才少年”美誉。14岁因连续击败日本职业棋客而受日本棋院濂越宪作之邀赴日留学。18岁创下全年四十四胜五败的最高胜率记录。19岁在被称为“不败的名人对鬼才吴清源的决战”的对局中与对手木谷实弈出举世瞩目的“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带来了围棋布局的一场革命,震撼了岛国棋界为小目定式所束缚的传统。从25岁开始的十五年间,以决斗式的“十盘棋”坐擂,将所有应战的日本一流高手的对局身份全部降级,不是降为相差一段的“先相先”,就是降为相差二段的“定先”。可谓所向披靡,在东瀛创造了一个围棋神话。当时,已是天下难寻能与吴清源一分轻敌的对手。战争期间及至战后多年,吴清源经历了诸多人生坎坷,如丧失国籍、遭遇车祸、被日本棋院除籍等等。古稀之年他辞别了现役棋士生涯,正式宣告引退并出版了回忆录《以文会友》,中文版名《天外有天》。

吴清源曾经创下的辉煌业绩和他淡泊如水的性情两相映照,这一点,与他的文艺界友人川端康成非常相似。两人甚至在外形上也有几分相同,都是瘦躯如鹤。据说当年两人曾经打赌,谁的体重先超过了45公斤就得请客庆贺。

川端与吴清源的交往离不开秀哉名人,而《名人》的成书也离不开吴清源。1932年(昭和7

① 川端康成《天授之子》,引自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23卷,第569页。

②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独影自命》第241页。

③ 川端康成《名人·舞姬》,叶渭渠、唐月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64页。

④ 羽鸟彻哉《中国与川端》,《成蹊大学文学部纪要》1997年第3期,第46页。

⑤ 川端康成《观战记——木谷·吴三番大棋战》,《东京日日新闻》昭和14年2~3月,引自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25卷,第179页。

年)1月,青年棋士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名人对局,川端观战并撰写《观战记》。这是川端第一篇涉及吴清源的文章。无独有偶,1938年的“秀哉名人围棋引退战”恰巧又是由吴清源担任解说。1939年(昭和14年),木谷实七段和吴清源六段在热海进行了三番棋的对局,川端再次观战并为《东京日日新闻》写了二十回的观战记。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中间休息时,川端夫妇和吴清源共同接受“伊古奈饭店”的邀请去伊豆下贺茂修养旅行,这次机缘使他们有了初次的亲密接触和心灵交流。此次交往,正值川端为创作《名人》而刚刚探访过秀哉名人之后。吴清源曾回忆说:“我们的交情从那时开始,真是缘分非浅。”<sup>①</sup>晚上,泡过温泉之后,吴清源“常去川端的房间里畅谈到深夜”,“话题从宗教到围棋,海阔天空”。<sup>②</sup>对于川端来说,“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吴清源关于人类精神力量的谈话。从佛教、儒教、神道到天理教、金光教、黑柱教以及人之道、生长之家,吴六段都有所涉及。似乎他潜心阅读过所有宗教以及心灵学的书籍,他谈到佛教与神道各派的异同,令我十分惊异。而且他对心灵学也颇有研究。可以说这样的学说令人心向往之,而丝毫没有迷信的成分。也就是说,这是修养之道,是为使自己的灵智澄静明澈。”<sup>③</sup>

吴清源曾经问川端如何才能成为一流的文学家,川端一时语塞,便反问道:“围棋呢?”吴清源的回答简短而清晰:“使头脑清静”。这一回答给川端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观战记——木谷 吴三番大棋战》和《月下之门——吴清源》等文章中多次谈及此事。<sup>④</sup>《名人》中有一段描写秀哉名人与大竹七段真正开始交锋时的表情和心绪,之后这样写道:“或是已经燃起斗志,气势逼人,进入了明净无我的三昧境界。莫非他成为‘常胜名人’的原因也在这里吗?”<sup>⑤</sup>“三昧境界”是指佛教中的“正定、专一、虚寂”,是佛教的重要

修行方法之一,意即令心神平静,杂念止息。这一“明净无我”的境界与吴清源所言“使头脑清静”是一致的。对局间歇,离开对局场地的秀哉名人“行走起来时,背影显出现今社会所看不到的一种平静,令人感到如同明治时代的遗老。”川端“面对这位名人的背影,不知怎的”,“眼睑也发热了,仿佛有什么深切的感受”。<sup>⑥</sup>触动川端心灵的,正是能够“使头脑清静”的精神力量。惟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足以超越纷繁动荡的战争时局,呈现出“现今社会所看不到的一种平静”。长期的棋道修养使得忘我的境界已经深深地渗透在秀哉名人身上。一次,名人夫人的妹妹带着初生的婴儿来访,婴儿哭闹不止,夫人万分焦急,生怕打扰了正在对局的秀哉名人。但事后一问,秀哉名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人造访,更没有听到婴儿的哭声。少年弟子们在家中的嬉戏打闹对于入定的秀哉名人来说也如同不存在。川端在小说中着意刻画了围棋世界中的忘我境界,“名人那种忘我精神与众不同,使人总觉得它仿佛消失在遥远的地方。”<sup>⑦</sup>

实际上,那场旷日持久的引退战是以“五十年不败”的秀哉名人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失败而告终的。比赛的对手是被称为“鬼才”的木谷实七段,他的体重是秀哉名人的两倍,而年龄却还不到秀哉名人的一半。这一比赛结果无论对于秀哉名人本人还是对于爱好围棋的日本国民,都是难以接受的。川端通过小说展现的是一种蕴藏于悲剧之中的深沉、伟大的力量。小说中棋手的风度、表情、动作和言谈等细节来自川端的仔细观察和真实记录。对弈时间、房间格局以至插花的摆放也都是忠实的描述。但是,棋手在对局中的心理变化、灵魂深处的震荡与慨叹等等,则是出于川端的艺术想象。他本人也承认这些内容从未向当事人核实过。川端对秀哉名人的了解并不多。二人都沉静冷峻、不苟言笑。有时川

① 吴清源《天外有天》,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90页。

② 同上。

③ 川端康成《观战记——木谷 吴三番大棋战》,《东京日日新闻》昭和14年2~3月,引自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25卷,第180页。

④ 参见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25卷第180页及第27卷,第454页。

⑤ 川端康成《名人·舞姬》第22页。

⑥ 同上,第35页。

⑦ 同上,第58页。

端去采访秀哉名人，竟会相对静坐，默然无语，这时往往由秀哉夫人出面周旋，谈话才得以重新开始。川端没有想到的是，在失败的阴影笼罩下，引退战后仅一年多，秀哉名人便溘然长逝。在秀哉名人去世之前两天，川端还到府上同他下了两盘将棋。那天，秀哉名人挽留川端夫妇共进晚餐，说要边吃边谈，但川端还是告辞了。第三天黎明前，噩耗传来。后悔晚矣，川端永远失去了与秀哉名人倾心交谈的机会。秀哉名人猝死之后，为了弥补已经铸成的过错，川端广泛结交秀哉名人的生前好友，并密切了同其遗孀季代子的交往，力图挖掘有关名人的资料，为小说积累素材。然而，川端又一次没想到的是，时隔不久季代子也因病故去。许多未曾开口的问题不得不空埋心底。日后，当川端面对另一棋坛圣人吴清源时，终于得到了补偿的机会。因此，在《名人》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转移和注入了川端对吴清源的敬意，对秀哉名人的想象中渗透着吴清源的影子。不难发现，川端笔下的秀哉名人和吴清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遣词用句都相同。川端“每次见到吴氏都感觉到一阵清新的香气(吴さんを見ると、いつも清新の香気を感じる)”，<sup>①</sup>而“秀哉名人只要面对棋盘，总让人感觉到一阵静静的香气使周围清新澄澈(名人が盤に向ふと、いつも静かな香気が、あたりを涼しく澄ませやうに感じる)”。<sup>②</sup>川端本人在谈论《名人》创作过程时明确说过：“吴清源九段在日本施展他棋艺才能的事也写进去了”。<sup>③</sup>川端把从吴清源那里得到的启发艺术地融入了《名人》的创作之中，将“人类精神”的力量、将“澄静明澈”的灵智赋予了笔下的秀哉名人。人的想象力是在多层面上发生的，它既与人的原始的出生有关、与文化的民族的源流有关，同时也不可能脱离当前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内容。川端创作《名人》时艺术想象的重要根基就是当时大量接触并有着深刻感触的吴清源的精神世界。

从1932年初次观看吴清源对局，直到谢世的

四十年间，川端康成关于吴清源的文章长长短短有十数篇，其中最长的就是随笔《吴清源棋谈》，达82页之多<sup>④</sup>。对于极少长篇大论的川端来说，堪称不惜笔墨了。1953年(昭和28年)川端为了写《吴清源棋谈》，专程去箱根的仙石原拜访了吴清源。在那里滞留了三天，这期间每天都要跟吴清源交谈三四个小时。吴清源也在《天外有天》中写及此事：“战后，为了写《吴清源棋谈》，他投宿于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阁，用了三天的时间到我那里采访。”<sup>⑤</sup>当时川端五十四岁，吴清源三十九岁。《吴清源棋谈》由41个短小篇章组成，每篇分别冠以“高原”、“传统”、“名人级”、“命运”、“乾隆”等小标题。川端在《吴清源棋谈》中描写了吴清源的身世、生活以及从棋历史等等，但他着意表现的是吴清源的人格与精神魅力。同一时期形成定稿的《名人》也有着一致的创作思路：“与其说我是观棋，不如说我是观察下棋的人。”“我不仅对棋赛非常感兴趣，也深为棋道所感动。”<sup>⑥</sup>《吴清源棋谈》完成于1953年，《名人》定稿本出版于1954年。《名人》的创作期间绝大部分是在秀哉名人去世之后，而与吴清源交往最为密切的阶段恰好覆盖了这一时期。

川端在论及吴清源的围棋观与人生观时，强调了吴氏关于“调和”的思想。《吴清源棋谈》中专辟“调和”一节记录并分析吴清源的这一思想。吴清源将博弈之道总结为调和，“围棋与其说是输赢胜负，不如说是调和。一子一子相互均衡，最终的棋局是作为调和的结果而建立的。”吴清源认为，棋盘之上逐一落下的棋子，无论它落在什么位置，都具有一种作用与力量，“一子之力，如能保持完全的调和，便彻底拥有了综合的力量。即使只有三子，这三子之力融合在一起，可以成为十五子，也可以成为十子。多少都可能。也就是说，根据三子综合调和的状况，其力量可多可少。所以，我总是努力地使自己的每一个子都能够拥有最高的作用与调和。对手无疑也为此而绞尽脑汁。这样一来，又产生了对手之子与

① 川端康成《吴清源棋谈·高原》，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25卷，第241页。

② 川端康成《名人》，引自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11卷，第467页。

③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文集·独影自命》，第244页。

④ 据新潮社1999年版《川端康成全集》，全37卷。

⑤ 吴清源《天外有天》，第90页。

⑥ 川端康成《名人·舞姬》，第61页。

自己之子、即白子与黑子之间的调和。黑白双方的技艺与实力如若非常悬殊,就会破坏这种调和。”在吴清源看来,输棋的根源就是丧失调和。正是由于围棋之道在于调和,所以不能勉强。如若勉强行事,便会失子失地。“黑白双方如能保持调和,先落子的一方必定坚持到最后。”<sup>①</sup>基于这种认识,吴清源认为,围棋之胜负不同于一般的胜负,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只不过人们把这一自然现象冠以胜负之名罢了。吴清源在他的另一个随笔集《莫愁》的“棋清谈”中说过,精进棋艺的方法“一是手段的研究,二是精神的修养”。所谓“精神的修养”即是对调和的追求。川端顺着吴清源的思路指出,如果将落于盘上的黑白之子视作有生命的存在,那么调和之道,便如同围棋的心灵了。

小说《名人》所展现的秀哉名人的棋风以及对整个棋局的评价,都明显地带有吴清源“调和论”的痕迹。“名人一直把这盘棋当作艺术品来精雕细刻。……围棋也是在一连串黑白相间下子的过程中,包含了创作的意图和结构,如同音乐,反映了心潮起伏和旋律。音乐若是忽然跳出一个古怪的音阶,或二重奏的对手突然伴奏出离奇的曲调,这就是一种破坏。……总之,大家对大竹七段的黑121感到意外、震惊、奇怪和怀疑;它破坏了这盘棋的节奏和旋律,这是无可争辩的。”<sup>②</sup>

随着对吴清源精神世界的了解,川端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吴清源对于围棋的起源有着独特的思考,这一思考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背景。在川端看来,关于围棋三百六十一路由模仿天体而来的说法已是陈词,并非吴清源的新说,但是吴清源将这一观点发展、深化了。吴清源首先否认了围棋发源于胜负之争:“据说围棋最早出现于太古时代,尧帝受仙人赐教之后,又将围棋传给了太子丹朱。然而围棋发祥之初并不是为争夺胜负,而是为了观测天文。在尚无文字的时代,棋盘与棋石只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sup>③</sup>川端认为,吴清源围棋起源说的真伪可以姑且不论,但从围棋并非源于胜负这一观点可以看出吴清源的人格。而这样

的人格与信条“是基于幼时的教育和国土的传统,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与中国古代相通的。吴氏的宗教式的、或者说修道式的精神与生活,来自遥远的世界。”<sup>④</sup>

那“来自遥远的世界”的“国土的传统”究竟是指什么呢?川端指出,“在古代的中国,人们似乎相信人类是从天而降的。在天上有神支配着下界,这就是人类的祖先”,所以中国人常常“祭祀先祖之天,并依照天意来行事。”“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人类既是生自上天,在人心产生之时必有天心隐于其中。通过自身的内省,也许可以直感到天意。因此,遵从内在于自身的天命,便是人类的德行。……联想中国的古代,至今仍相信神之存在的吴氏,他的天带有修道式的高尚。吴氏在关于围棋起源的想象中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天。”<sup>⑤</sup>川端试图说明,吴清源通过对围棋艺术的钻研和反思,悟出了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而不断的自我修炼与内省所要达到的,是一种和谐均衡的境界。佛家禅宗教人修为当持“平常心”。吴先生在对局中也保持着“平常心”,追求自然与和谐。围棋到了这般境界,的确堪称心灵修为的大道了。吴清源爱读“易经”、“中庸”,他的博弈之道,是有中国深厚的哲学思想和宗教式的悟道作背景的。

金庸在《崇高的人生境界》中也对吴清源的调和理论赞赏不已:“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更由于他将这门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吴先生在围棋艺术中提出了‘调和’的理论,以棋风锋利犀利见称的饭田荣男先生也对之一再称誉,认为不可及。吴先生的‘调和论’主张在棋局中取得平衡,包含了深厚的儒家哲学和精湛的道家思想,吴先生后期的奕棋不再以胜负为务,而寻求在每一局中有所创造,在艺术上有新的开拓。放眼今日中日棋坛,能有这样胸襟的人可说绝无仅有……”<sup>⑥</sup>

川端认为,棋道修养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是

① 《吴清源棋谈·调和》,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25卷,第265~266页。

② 川端康成《名人·舞姬》,第87页。

③ 吴清源《天外有天》,第239页。

④ 《吴清源棋谈·祭》,引自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25卷,第300页。

⑤ 《吴清源棋谈·天》,引自新潮社《川端康成全集》第25卷,第301页。

⑥ 转引自《天外有天》,1996年10月。

东方式的,因此“围棋对西方人来说,可能不大合适吧。”他在小说《名人》中发表了一番关于棋道与东方精神的感慨:“一般来说,西方人下围棋,缺乏围棋手的气质。日本的围棋,已超出了娱乐和比赛观念,成为一种技艺。它贯穿着自古以来东方的神秘色彩和高雅精神。”“据说,在中国,人们把围棋看成是仙心的游艺,充满了天地之元气,三百六十有一路包含着天地自然和人生哲理。”另一方面,川端在明确了围棋的中国源流之后,强调指出,“开拓这种智慧之奥秘的,正是日本。日本的精神,超过了模仿和引进。从围棋来看,这种情况是很明显的。”据一般资料记载,围棋起源于中国四千年前原始时代末期,春秋战国时期即有了关于围棋的文字记载,唐朝传入日本。但是,这之后“经过漫长的岁月,日本围棋的智慧也没有培植起来。”在长期的沉寂之后,围棋原有的规则被日本人按照自身的状态和需要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设定,终于作为一种可利用的成分融入了日本文化之中,从而“如同能乐、茶道一样,早已根深蒂固地成为日本不可思议的传统”,成为日本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①</sup>这段论述,已经超越了围棋本身,传达出了川端关于日本文化对异文化受容与变异的思考。与吴清源的倾心交谈乃是促成这一思考的契机。

不过,与川端不同的是,吴清源并不赞同围棋传入日本后在规则上产生的一系列变化。“我以前就认为日本棋院的规则不合理。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围棋规则不仅作为规则而且作为思考方法都是顺乎自然的,因而没有硬性改变它的必要。应当说明,中国的围棋规则是伴随围棋的发祥与发展而锤炼成型。这与国度、政治毫无关系。”<sup>②</sup>而川端则对业已融入日本文化的围棋极力肯定,认为“真正的围棋是在日本形成的”,宣称现在乃至三百年前“中国的棋艺同日本无法比拟。围棋的高深,是由日本人探索出来的。”<sup>③</sup>当然,如前所述,川端并不否认中国创造围棋的功绩。在他看来,围棋这门艺术萌芽、诞生于中国,发展并成熟

于日本。川端文学研究家羽鸟彻哉曾经这样评论过《吴清源棋谈》:“这里寄托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致力于发见日中相互作用与融合的象征。”<sup>④</sup>在这一点上,《名人》与《吴清源棋谈》是相同的。

川端还从吴清源的个人命运,联系到了民族文明的发展,通过对围棋在中日两国发展历史的回顾,反思了应该如何对待民族传统的问题。这一系列思索的结果都反映在了《名人》之中,“我觉得中国围棋的历史远比日本悠久,它的智慧在这位少年身上放射出了光芒。只不过是,在他背后的这一股强大的光源沉沦在深深的泥土里。吴有天才。尽管如此,倘使幼年时代没有机会进行磨练,他的才华也就无法发挥,终于会被埋没。……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说,人的能力常常会遭到这种命运。一个民族的智慧,过去的光辉灿烂,现在有减弱;或是过去到现在一直被埋没,将来却一定会发挥出来,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sup>⑤</sup>无论是川端本人,还是日本文学评论界,都把《名人》这部作品的体裁划定为小说。而在小说中大段地发表对于文化艺术问题的思考,不能不说是十分独特的。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先生指出:“所谓‘文学’,可以说是在精神形态中以艺术形式显现‘人’的美意识。”<sup>⑥</sup>这里的“艺术形式”,是作者自己选择的结果。作者首先在自己生存的文化场中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文化现象,进而在创作过程中以自身的认知形态加以虚构、象征或隐喻。因此,当一个文本生成的时候,作者作为“人”的美意识特征,已经通过对故事的编纂、情节的加工和人物的刻画等手段渗透于作品的字里行间了。川端康成在同时代的众多人物中关注了名人,关注了吴清源,并且在小说中将二者的精神世界加以融合,同时注入了自己的审美感悟,最终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的艺术形象。现实生活中的名人与文学作品中名人的距离,显露了作者的审美价值取向,也显露了横向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纵向的历史文化传统。

① 此段引文均见川端康成《名人·舞姬》,第62~63页。

② 吴清源《天外有天》。

③ 此段引文均见川端康成《名人·舞姬》,第63页。

④ 《中国与川端》,《成蹊大学文学部纪要》1997年第3期50页。

⑤ 川端康成《名人·舞姬》,第64页。

⑥ 严绍,《“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第3页。

当川端在《名人》中抒发他对于文化艺术的感怀时,已经年过半百。五十岁的川端曾经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划上一道界线,他认为今后“已经只能吟咏日本的悲哀”,<sup>①</sup>决定从此走一条回归日本传统的道路。五十岁是川端“开始新生命的一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座分水岭。时世的变

迁、思想的成熟,都影响了《名人》的创作。试想,倘若《名人》在秀哉名人引退战之后的两三年内即完成,那么,它一定不会呈现出如今的面目。正是在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诞生了《名人》这部作品,并使之具有了独一无二的特性。

(作者通讯地址:周 阅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 100083)

---

<sup>①</sup> 川端康成《不灭的美》,见《川端康成文集·美的存在与发现》,叶渭渠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17页。